

毛毛 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出版部

我的父亲  
*Wo De Fuqin Deng Xiaoping*

邓小平

图文版

我的父亲

Wo De Fuqin Deng Xiaoping

邓小平

图文版

毛毛 / 著 【中卷】

中央文献出版社

 大象出版社

# 目 录

|                       |     |
|-----------------------|-----|
| 1 向大西南进军              | 4   |
| 2 西南局第一书记             | 7   |
| 3 高饶事件前后              | 9   |
| 4 八大的光辉               | 16  |
| 5 从“大跃进”到七千人大会        | 19  |
| 6 多事的1966年            | 25  |
| 7 祸起萧墙                | 29  |
| 8 炮打司令部               | 35  |
| 9 批判刘、邓               | 37  |
| 10 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起总攻 | 41  |
| 11 打倒刘、邓、陶            | 44  |
| 12 “邓小平专案组”           | 48  |
| 13 天降横祸               | 56  |
| 14 “九大”与“继续革命”        | 61  |
| 15 战备疏散               | 64  |
| 16 初到江西               | 67  |
| 17 劳动生活               | 71  |
| 18 回家啦!               | 76  |
| 19 不变中的变数             | 80  |
| 20 不安定的“平静日子”         | 83  |
| 21 朴方的遭遇              | 88  |
| 22 峰回路转               | 96  |
| 23 解除禁锢上井冈            | 101 |
| 24 故地重游               | 105 |
| 25 再见了,步校             | 110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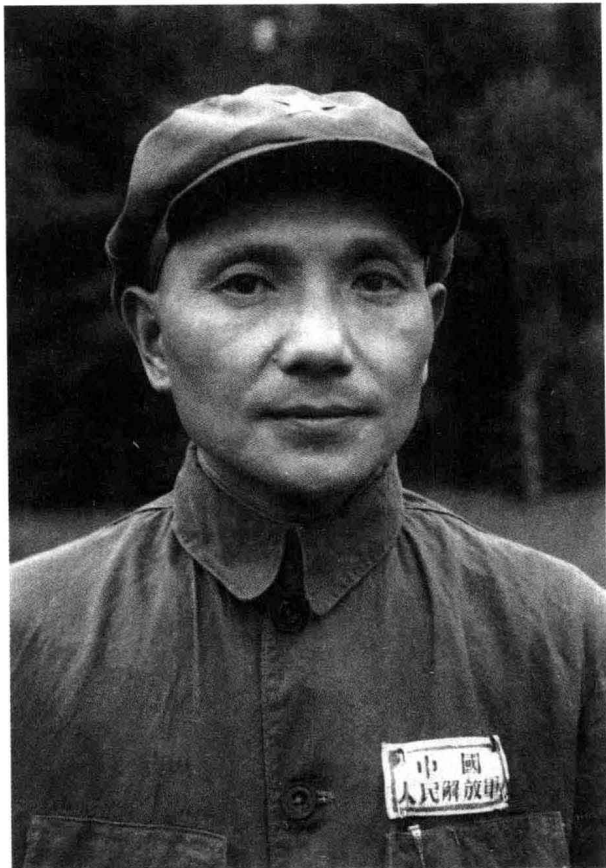
# 目 录

|                      |     |
|----------------------|-----|
| 26 复出工作              | 115 |
| 27 进入军委、政治局          | 119 |
| 28 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风波       | 123 |
| 29 意味深长的四届人大         | 127 |
| 30 全面整顿的序幕           | 138 |
| 31 全面整顿              | 140 |
| 32 全面整顿三个文件          | 154 |
| 33 伟大成就              | 160 |
| 34 “评《水浒》”与最后的周恩来    | 167 |
| 35 恶人先告状             | 171 |
| 36 艰难时日              | 177 |
| 37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 187 |
| 38 伟大的四五运动和邓小平的再次被打倒 | 192 |
| 39 波澜不惊              | 200 |
| 40 一代伟人毛泽东逝世         | 206 |
| 41 彻底粉碎“四人帮”         | 210 |
| 42 光辉的复出             | 215 |
| 43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          | 220 |
| 44 中央顾问委员会           | 229 |
| 45 百万大裁军             | 233 |
| 46 享誉国际外交舞台          | 236 |
| 47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 244 |
| 48 退休的这一天            | 250 |
| 49 永远的思念             | 255 |

# 1 向大西南进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但歼灭国民党军队的任务仍在继续，战争并未结束。

中央部署：第一野战军出陕甘，解放西北五省；第二野战军，直进黔川，解放大西南；第三野战军，



南下福建，解放东南沿海；第四野战军，先取广州，解放中南各省。时不我待，我各部大军，不分先后，早已如弦上之箭，倏然而发。

刘邓要率第二野战军奔赴西南了。并肩作战近一年的刘邓陈就此告别，刘邓陈的二、三野战军也要分开行动了。

根据进军大西南的需要，中央决定，成立西南局，我父亲任第一书记，刘伯承、贺龙分任第二、第三书记。

解放大西南的任务，落在了第一、第二野战军的肩头，由二野从东向西，由一野从北向南，两路出击，把国民党在西南的军队全部消灭。

1949年10月20日，刘伯承和我父亲率第二野战军总部从南京出发，向西进军，10月23日到达郑州，10月28日进驻武汉。

解放大西南，核心是要拿下四川。因为四川乃是大西南的心脏。刘邓先是作出佯动，假示大军要由郑州向西动作，实际已令陈锡联的第三兵团从东直入川东地区；杨勇的第五兵团向南迂回，进入贵州，切断敌人南逃后路。

刘邓大军从东西500公里的地段的突然多路进击，完全打乱了蒋介石的整个西南防御部署。

也正是所谓的兵败如山倒。国民党部队已溃不

1949年，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时的父亲。



1949年10月，刘伯承（右二）、我父亲（左一）、李达（右一）、张际春（左二）等在南京一起研究进军大西南。

成军，只有夺路逃窜一条路了。这国民党军逃命可也是逃得真快，原来中央定的我军稳健进军的方针，也“稳健”不得了。敌军跑得快，我军必须追得更快！

我军冒着阴雨，踏着泥泞，爬高山过丛林，不顾休息，不顾吃饭，争先追敌，神速地切断了川军向南撤退的退路，并已将战剑直指重庆、成都。

11月30日，陈锡联三兵团轻取重庆。重庆失守，蒋介石又令其部队撤至成都地区。刘邓下决心，将蒋介石最后一支主力胡宗南集团，全歼于成都盆地。

12月20日，我军完全截断了胡宗南的退路，从西、南、东三面对成都地区形成袋形包围，由杨勇统一指挥。

胡宗南曾在陕北骄横一时，而如今，已成为笼中困兽。他手下的数十万之众，也已军心大乱了。胡宗南抛下他那已陷于绝望境地的众兵将，坐飞机只身逃跑了。

12月27日，成都之敌为刘邓大军全歼。成都宣告解放。

这时，在云南的滇军宣布起义，陈赓第四兵团解放云南全境。此后，陈赓又率第四兵团在四川西昌地区歼敌一万，致使残存于西南地区的蒋介石正规部队全部被肃清。

在大西南，只有最后一个地区还未解决，那就是西藏。毛泽东授命刘邓大军，担负起进军西藏的任务。1950年10月，我军用18天的时间，在西藏东部大门昌都发起战役，歼灭藏军5700余人，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

在我对西藏各界人士多方工作和和平诚意的感召下，西藏地方当局决定响应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赴京，和中央政府代表谈判。1951年5月23日，谈判双方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1951年8、9月，刘邓的部队开始向世界屋脊进军。他们攀越了十余座雪山峻岭，跨过了许多条怒涛激流，穿过了壮丽的原始森林，走过了无边无际的草原沼泽。他们不畏气候严寒，不怕空气稀薄，踏着千年积雪，终于在10、11月间进入了西藏的首府——拉萨。

西藏，是一个宗教习俗极其浓厚的地方，而且还处于封建制度和奴隶制度相交织的时代。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不住民房，不进佛堂，不借民具，宁愿风餐露宿，宁愿日晒雨淋，把铁的纪律和保护尊重民族、宗教习惯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同时，他们还积极与各界人士接触交流，给缺医少药的藏族人民看病治病。解放军严明的军纪和民族平等的作风，打动了西藏人民的心，受到了藏族同胞的热情欢迎。

西藏和平解放了，中国大西南全部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刘邓大军以勇猛不可阻挡之势，行进2000余公

里，光荣而又胜利地完成了解放大西南的任务。大西南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在大陆最后的残余部队90万人，消灭盘踞在大西南无恶不作的土匪90万人。

在刘邓第二野战军进军大西南的同时，我第一野战军解放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第三野战军进军华东南地区后，解放了福建及东南沿海大部分岛屿；第四野战军解放了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中南地区；华北军区解放华北全境。至此，中国大陆全部获得解放。

1949年12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举行进入大西南的心脏——重庆的入城式。

12月8日，刘邓率野战军机关进入重庆。

此前，中央已命令成立西南军政委员会，刘伯承为主席。尔后，中央又命令成立西南军区，贺龙为司令员，我父亲为政委。西南的工作，由西南局书记邓小平主持。刘邓大军驻扎在大西南了。

这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从西北高原，走进晋冀鲁豫战场，经过中原大战，挺进华东战线，最后，一直打到大西南。这支部队，在刘邓亲率下，从太行山，跃进至大别山，又从大别山，最终一跃而上喜马拉雅山。

这支部队，先后歼灭国民党军230万人，消灭

土匪100余万人。

这支部队，为中国革命，为伟大而壮阔的人民革命战争，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这支部队的政委，我父亲，是用一种特殊的感情和平和的口吻来形容这支部队的。他说：“不务虚名，注意内部团结，这种作法贯穿到二野部队整个作战过程中。所以二野内部是非常协调的。各纵队之间，部队与部队之间，人与人之间，甚至更下层一点，彼此关系都是很协调的。从战争一开始，每一次的具体作战，指挥的都是各纵队的头头，刘邓没有亲自到战场上指挥过一个具体的战斗行动。有的战斗是陈再道指挥的，有的战斗是陈锡联指挥的，有的战斗是王近山、杜义德指挥的，也有的是杨勇、苏振华指挥的，还有的是陈赓、谢富治指挥的。采取这种方式的好处，是发现有不妥的地方，有电话可以联络。我们没有发现过下面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也没有纠正过任何一个纵队领导同志指挥的战斗。这种做法对增加上下信任，增强部队的战斗力，锻炼指挥员的能动性很有好处。”他说：“总的来说，在战争中二野挑了重担，完成了任务，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委托。就是这么个历史。苦头吃了不少，但困难都胜利渡过了。”平平淡淡，就这么几句话，没有豪言壮语，也没有任何的骄傲和自夸。就好像一个老人，在给后人讲点什么故事。言无重话，语不惊人。但是，其中所具有的内涵，其中所包括的艰难与辛苦，其中所含纳的功绩与荣耀，其中蕴藏的激情与壮烈，又怎能用三言两语所能叙说得完，讲述得清？

有人说，时间可以磨掉一切人生的痕迹。但，却磨损不掉在人们心目中那高高耸立的丰碑。

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在《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上签字。



## 2 西南局第一书记

父亲又回到了四川。回到了重庆。回到了他的故乡。当年16岁的求学少年邓希贤，已成长为率领着千军万马前来解放四川的首席指挥员，已成长为主持中国西南大局的中共高层领导人邓小平。

从重庆走出，从四川走出，又回到重庆，回到四川。命运将父亲的人生历程在这29年间，划了一个曲曲折折的圆圈。

在重庆，父亲终于建立了一个安稳的家庭。

南下时候，因为军情没有那样险峻和危急，所以，父亲和刘伯承两人，都是携带家眷南进的。两辆美国吉普车，刘家一辆，邓家一辆。刘家大人小孩共六口人。邓家还是两个大人，三个小孩。但是，实际上，妈妈的肚子里，已经又有了一个小小的生命，那就是我。

我的哥哥姐姐们总是说，他们参加过抗日战争，资历最差的也是参加过解放战争。而我呢，只好反唇相讥道：我也参加过解放战争，参加过解放大西南，只不过是妈妈肚子里罢了。

这么两辆吉普车，颠颠簸簸地，走了2000多公里，到了四川。四川解放了，新中国成立了，我才降生了。

在重庆，我们家住在原来国民党一个机关的楼上。刘伯承调到南京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后，贺龙一家就住在我们家的楼下。

刘伯承调往南京工作后，在西南，在四川，主



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委时的父亲。

持军政工作的主要是父亲和贺龙。

到了西南，父亲工作之繁忙分毫不让战时。你想，又管军事，又管政治，又管经济，还有民族问题，

也是千头万绪，不容闲暇的。他说，西南的任务是：九十万、六千万、六十万。“九十万”，指的是要把战争中俘虏和投诚的90万原国民党部队改造过来，成为人民的军队，成为能工作、能生产的人。“六千万”，指的是西南7000多万人口中，有6000多万是我们要依靠的人民群众，要把人民组织起来，实行土地改革，组织生产，恢复经济。“六十万”，指的是我军在西南的60万部队，要把战斗队变为工作队，提高素质，加强纪律，去创造和建设一个新的大西南。

做地方工作，父亲的风格，与做军事工作一样，作风是简单明了，处理问题明确果断。

在西南期间，父亲还决定了两件大事，第一，是修筑从拉萨到青海的青藏公路。第二，是修筑成都到重庆的成渝铁路。

父亲心里明白，仗虽打完了，而建设一个新中国，比起打仗，将会工作更多，任务更重。

在此以后，经过两年的治理，大西南的秩序迅速稳定，经济开始恢复，一切工作均逐渐走上了正轨。

.....



1949年10月，第二野战军进军大西南，我父亲是政委。图为父亲在郑州火车站与送行者握手。



1950年7月，父亲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讲话。

在重庆，我和弟弟相继出生。我们两个算是真正的四川人。其实，我弟弟是拣来的。当时，我们家已有四个孩子，三女一男，有了第五个孩子后，妈妈正好在重庆的人民小学中当校长。她那个时候忙极了，不想再生孩子了。结果二野的卫生部长说：“也许这是一个男孩子呢？”为了这句话，飞飞幸得生命。结果，这个本不想要的孩子，反倒成了父母亲心中最疼爱的孩子。

在重庆，我的祖母从乡下来了。听说我的父亲回四川了，祖母兴奋之极。她拿起一把锁，把大门一关，一个人，拿着一个小小的包裹，坐着她那在嘉陵江上推船的父亲的小船，来到了重庆。她老家也不要了，田产和房产都不要了，从此便和我的父母亲住在了一起。

总之，在重庆，我们这个家的基本队伍就到齐了。这个队伍的规模一直保持了20年，直到我们这一代又成家生孩子以后，家庭的规模才扩大了起来。

### 3 高饶事件前后

1952年，父亲奉中央调遣，到北京工作。父亲携家又一次离开四川。

这是他一生中的第二次出川。第一次出川，他向那未知的人生，迈出了第一步。这第二次出川，他



初任政务院副总理时的父亲，时年48岁。

开始迈向他一生中那日益光辉的未来。

父亲来到北京，担任了中央政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后又先后兼任过财政部部长、交通部部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等职。

在父亲来京的同时，高岗、饶漱石、邓子恢、习仲勋也陆续离开东北局、华东局、中南局、西北局，赴京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高岗赴京后，除继续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职务外，还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饶漱石进京后，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职务。应该说，当时高岗、饶漱石是很受党中央和毛泽东器重的，特别是高岗的权力、地位甚为显赫，一时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由高岗担任主席的国家计委亦有“经济内阁”之称。但高岗、饶漱石权欲熏心，对这样的安排仍不满足。特别是高岗，对其职位在刘少奇、周恩来之下，一直耿耿于怀，尤其是对刘少奇不服和不满。

1953年初，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意见，在周恩来主持下，做出了《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和加强中央人民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对政务院工交、财贸、政法、文教等各口的工作，中央也做了大幅度的调整，重新进行了分工：外交部工作，由周恩来负责；计划工作和八个工业部工作，由高岗、李富春、贾拓夫负责；劳动工资工作，由饶漱石负责；铁路、邮电工作，由邓小平负责；……这些分工，是中央为加强集中



1952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右起：郭沫若、黄炎培、我父亲、沈钧儒。

统一领导所采取的重要措施。但是，高岗错误地认为，这是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不信任，是削弱周总理对政府工作领导权的步骤。他以为自己的权势在日益扩大，地位也在不断提高，有可能担任更高的职务，于是更加妄自尊大，目空一切，个人野心急剧膨胀起来。

1953年底，在党中央准备撤销中央局、大区行政委员会的同时，毛泽东为了减轻自己担负的繁重的日常工作，加强集体领导，提出将中央的领导班子分为一线、二线。这样，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将进行大幅度调整，人事安排也会作相应的变动。高

岗、饶漱石闻讯后更加紧了其阴谋分裂党的活动。1953年夏秋之际，在中央召开全国财经会议和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前后，两人急不可耐地跳了出来，“这边一炮，那边一斗”，演出了一场企图分裂党的“二重奏”。

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高、饶和极少数追随者利用这次会议批判新税制错误之机，利用党内存在的分歧，在会上发表种种无原则的言论，制造党内纠纷。在会外，他们散播流言，诬蔑中央有所谓的“圈圈”和“摊摊”，攻击中央领导核心中的刘少奇和周恩来，吹嘘他们自己。由于高、饶的有意捣

乱，致使会议无法按原定方针进行下去。原定6月开始，7月结束的会，一直拖到了8月初。毛泽东很重视这次会议，十分关心会议的进展情况。当他看到会议偏离了方向，就马上交待中办主任杨尚昆打电话到北戴河搬兵，请正在那里休息的陈云、我父亲火速回来参加会议。8月6日，陈云和我父亲都在会上发言，讲了些公道话。这样会议的气氛才缓和下来。8月11日，在周恩来作了总结之后，宣布会议结束。

财经会议后，高岗以休假为名，到华东、中南地区继续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他还伙同饶漱石，利用各种场合，散布所谓“军党论”，把中国共产党



1952年，父亲到中央工作后，假日里在颐和园散步。

分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与“白区的党”两部分，并自封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人物。他们提出，党中央和国家领导机关掌握在以刘少奇为首的“白区的党”手里，应当彻底改组中央。企图借此煽动红区干部和军队干部跟他们一道，拱倒刘少奇、周恩来，由他高岗来当中央第一副主席和政务院总理。

在1953年9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身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饶漱石极力配合高岗的行动。他未向党中央汇报便开展了对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的批判，欲以达到反对刘少奇、分裂党中央的目的。对此，在连续几天的领导小组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央明确指出中央组织部过去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在工作中是执行了中央的正确路线的。对于这个部过去工作中存在的某些缺点和错误，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坦荡胸怀，主动承担了领导责任。我父亲也在会上强调：中组部工作的成绩，“是与毛主席特别是少奇同志的直接领导分不开的，但子文同志也有成绩，不能设想只是领导得好、他们做不好而会有成绩。”与会的中央领导同志也本着对待犯错误同志一看二帮的精神，在发言中都给了饶漱石一个体面退却的台阶。但饶漱石最后发言时，仍然坚持自己“原则正确，方法错误”，不肯老实认错。

看到来明的不行，高、饶就来暗的。他们企图拉拢中央和各大区的负责人，他们先是拉拢了中南军政委员会负责人林彪。紧接着，高岗来找我父亲，企图挑拨他与中央其他负责人的关系，并以更高的官位相利诱，以求取得我父亲的支持。高岗对我父亲说：在中国谁是列宁的问题解决了，但谁是斯大林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你看是谁呀？父亲看穿了高岗的用意，故意指着墙上挂的几张中央书记像说，就在这中间嘛！并明确向高岗表示了自己的态度，



1952年秋，父亲同陈云在登山途中休息。

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见拉拢我父亲不成，又去拉拢陈云。他对陈云说：要搞副主席就多搞几个，你一个，我一个。结果，同样遭到陈云的断然拒绝。

对于高岗的不正常举动，父亲和陈云都觉得这是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事态发展下去，有分裂党的危险，于是，他们及时把这件事向毛泽东做了汇报。事隔20多年后，1980年3月，父亲在同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同志的谈话中，回顾了他所亲身经历的这场党内斗争的情景，他说：“这个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在1953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

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话，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

我父亲和陈云的这一行动，可以说是反对高岗、饶漱石的反党阴谋的转折点。在此之前，毛泽东虽然发现了高、饶的一些不正常的活动，但并未把它看得很严重。在听了我和陈云的汇报后，他立刻高度警惕，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同时开始削弱高、饶的权力。

1953年12月2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批



1952年7月1日，父亲出席成渝铁路通车典礼，在纪念册上签名。

评高岗、饶漱石反党阴谋活动。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话，他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指出了高岗反党阴谋活动的性质及其严重性，向高岗的阴谋活动提出了严厉警告。同时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提出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1954年2月6日至10日，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揭露和批判了高岗和饶漱石的反党分裂活动。朱德、周恩来、我父亲、陈云等人先后发言，严肃批评高岗、饶漱石破坏党的团结和统一，篡党夺权，阴谋分裂党的活动。会议要求全党对野心家、阴谋家提高警惕，希望他们幡然悔悟，改正错误。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但是，高岗、饶漱石仍然执迷不悟，不做深刻检讨，不愿痛改前非。高岗还以自杀（未遂）与党对抗。

全会之后，中央书记处在2月中旬分别召开了高岗问题、饶漱石问题的两个座谈会。受中央之托，周恩来主持高岗问题座谈会，我父亲、陈云、谭震林主持饶漱石问题座谈会。随后，在中央政治局领



1952年8月，人民解放军建军25周年，全军体育运动大会在北京举行。我父亲和朱德、贺龙在主席台上。



1953年秋，在十三陵，朱德和彭德怀对弈，两帅相持不下，父亲在旁边观棋。

导下，东北局、华东局、山东分局和上海市委等又召开专门会议，对高饶问题进行揭发和批判，在无可抵赖的事实面前，高岗仍拒不悔改，自绝于党和人民，于8月17日再次服安眠药自杀。

1955年3月21日至31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父亲代表党中央作《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全面论述了党同高饶反党联盟斗争的经过，以及进行这场斗争的重要意义和经验教训。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宣布将他们两人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至此，这场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全党的团结和统一得到了维护和加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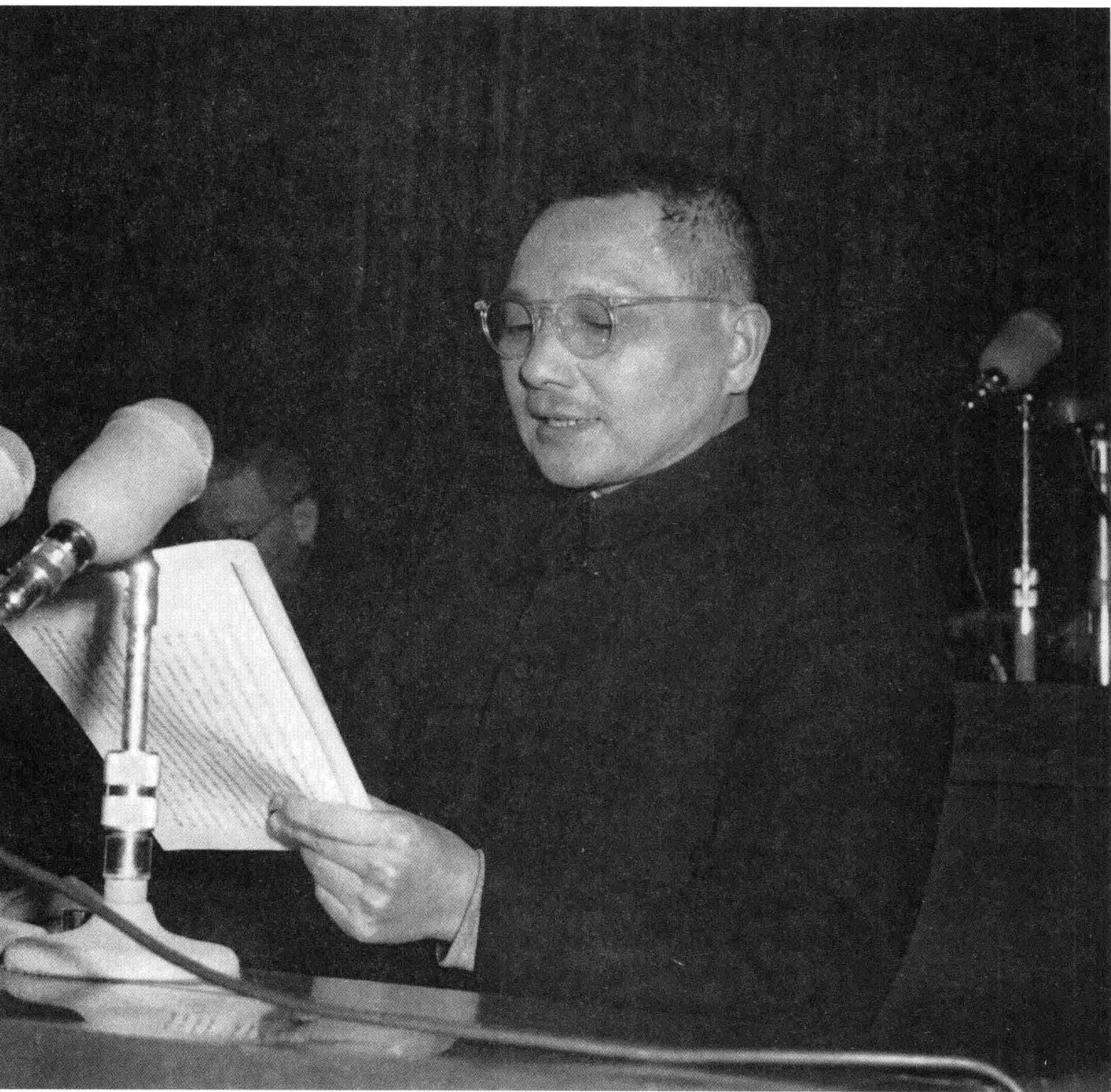
1956年9月16日，父亲在八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再一次向全党指出：“高岗、

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基本特点，就在于进行毫无原则的广泛的阴谋活动，企图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这一联盟企图把持某些地区和某些工作部门，作为反对中央和进行篡夺活动的‘资本’，并且为着同一目的，在各个地区中和人民解放军中，进行反对中央的煽动。他们的阴谋活动，完全违反党和人民的利益，而仅仅有利于中国人民的敌人。”“党中央决定开除高岗和饶漱石的党籍，因为他们的行为，对于党和人民的利益，有极端严重的危害，并且他们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前后的长时期中，在党再三向他们敲了警钟以后，他们仍然没有悔改的表示。党中央在1953年夏季召集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和同年9、10月间召集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都着重地要求全党加强团结，反对破坏团结的行为，但是，这些醉心于分裂党和夺取权力的阴谋家完全置若罔闻。”在1980年3月的一次谈话中，父亲再一次充分肯定了这次党内斗争的正确做法和成功经验。他说：“高岗是搞阴谋诡计的”，“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高饶问题的处理比较高，当时没有伤害什么人，还有意识地保护了一批干部。总之，高饶问题不揭露、不处理是不行的。现在看，处理得也是正确的。”

对于刚刚到中央工作不久的父亲来说，这场反对高岗、饶漱石的反党阴谋的斗争，无疑是一次非常严峻的考验。在这场斗争中，父亲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充分表现出了对党高度忠诚负责的优秀品质和出色的组织才能，深得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器重和信任。1954年，父亲出任党中央秘书长，并兼任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主管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和组织工作。

1955年3月，父亲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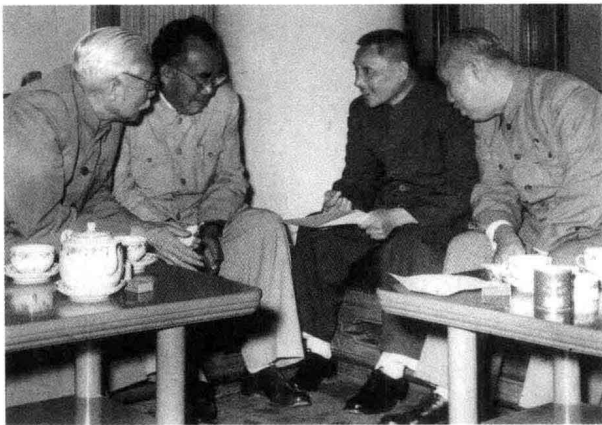
## 4 八大的光辉

1956年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进程中极其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执政以后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八大，确定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195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宣布：中央决定1956年下半年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部长，父亲肩负起了筹备工作的重任，从起草大会的报告到安排大会的具体日程，从审阅大会的发言稿到安排大会发言，从讨论八大代表选举问题到起草大会通知，关于八大的大事小情，他几乎都参与了。

为了更直接地、具体地准备八大会议，中共中央于1956年8月22日召开了党的七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父亲就八大的六个文件作了说明。他强调，八大议题和安排发言，应该突出八大讨论国家经济建设的主题。对此，毛泽东和与会者深表赞同。毛泽东说：小平同志说得对，这一次重点是建设。报告里面有这么几个大题目，都可以讲。但是重点是两个：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一个是经济建设，这两个重点主要还是在建设。

根据安排，父亲要在大会上作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因此，《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是在他的亲自主持和领导下进行的。对于修改党章工作，他不仅抓大势，抓方针性的意见，而且连报告的具体细



1956年9月，我父亲和朱德（左二）、董必武（右一）、林伯渠（左一）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

节、报告的字句都注意到了。在紧张、繁忙的筹备工作中，他自己动手，对报告进行了数次重要的修改。改动内容最多的是第一部分关于修改党章所根据的条件。在此，报告从党组织的状况分析入手，阐明了我们党处于执政以后所面临着新的考验，指明了面对这种新的考验所应当采取的办法。此外，对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实行民主集中制等部分，他也作了不少修改。对于报告的文字，他也是力求简洁、顺畅。所以，报告的文字虽然较长，有29000多字，但字句简洁，生动有力，体现了他一贯的文风。

1956年9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这是八大前召开的最后一次中央全会的最后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专门讲了